

潘卓林, 刘晔, 刘于琪, 李志刚. 2020. 基于场域理论的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研究——以广州猎德复建房社区为例. 热带地理, 40 (6): 981-992.

Pan Zhuolin, Liu Ye, Liu Yuqi and Li Zhigang. 2020. Citizenization of Villagers in City Based on Field Theory: A Case Study of Liede Redeveloped Community, Guangzhou. *Tropical Geography*, 40 (6): 981-992.

基于场域理论的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研究 ——以广州猎德复建房社区为例

潘卓林¹, 刘晔¹, 刘于琪², 李志刚³

(1. a.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b. 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 广州 510275; 2.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 香港 999077; 3. a.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b. 湖北省人居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0)

摘要:以广州市猎德复建房社区为案例,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剖析改造后村民市民化进程问题;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和质性分析方法,从经济融合、社会文化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4个维度探讨村民的市民化水平。结果表明,由于村社共同体这一特定场域的延续,村民经济资本转化不畅,村民的社会、文化和象征性资本相对匮乏以及村民既有惯习的固化和自我改变动力的缺失,尽管村民在改造后经济状况、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村民仍处于“半市民化”状态,在经济融合层面就业难题尚未解决,在社会文化适应层面老一辈村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固化,在结构融合层面社会网络拓展受阻,在身份认同层面对市民角色的认识不足。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应当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大力推进村社共同体转型,并将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视作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切实提升村民的人力与社会资本,促进村民融入城市社会。

关键词:城中村;场域理论;村民市民化;广州;猎德

中图分类号: TU984.1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5221(2020)06-0981-12

DOI: 10.13284/j.cnki.rddl.00328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用地日趋紧张,各大城市逐渐由“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转型,掀起了城中村改造的热潮。然而,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往往强调经济效益(刘宣, 2010; 叶裕民, 2015; 郭友良等, 2017),忽视了改造背后的社会效益(谭肖红等, 2012; Lin, 2015),造成了村民再就业困难、社会保障不健全、农民身份认同留存等市民化滞后问题(刘晔等, 2012; 黄文伟等, 2015; 王娟, 2015)。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进程缓慢不仅会造成城镇化社会成本过高和公共资源浪费等问题,更有可能激化村民和市民之间的社会矛盾,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在“人本主

义”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深入了解城中村改造后村民市民化滞后问题的根源,完善城中村改造政策,有助于推动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多个维度的共同推进与相互衔接。它不仅指代农业转移人口在生活空间与社会身份方面的非农化转变,更伴随着市民权利的获取、角色意识的重塑、行为与价值观念的转变等等(杨菊华, 2009)。市民化过程不仅需要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外部“赋能”(empowerment)——通过制度等赋予个体作为城市居民基本的权益,更需要个体的自身“增能”——在社会环境变迁的过程中不断

收稿日期: 2020-02-17; 修回日期: 2020-08-0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40, 41971194)

作者简介: 潘卓林(1995—),女,广东韶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地理和人口地理, (E-mail) panzh16@mail2.sysu.edu.cn;

通信作者: 刘晔(1986—),男,广东广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地理、城市地理和健康地理, (E-mail) liuye25@mail.sysu.edu.cn。

发展学习与适应的能力,从而实现社会角色的全面转型(郑杭生,2005)。实际上,市民化是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而社会融合理论最早源于西方国家关于跨国移民与少数族裔的同化和融合研究,其中同化论(assimilation)、区隔融合论(segmented integration)和多元文化论(pluralism or multiculturalism)的影响较为深远(Park, 1939; Gordon, 1964; Portes et al., 1993)。同化论指出,经过经济竞争、政治冲突、社会调节以及文化融合等互动过程,移民或少数族裔最终会融入到主流社会(Park, 1939; Gordon, 1964);在此基础上区隔融合论进一步补充与发展,认为由于第二代移民在身份认同、文化适应等方面都与第一代移民存在较大差距,他们的融合过程与结果往往更为复杂,而非简单的递进关系(Portes et al., 1993);而多元文化论则指出,移民在重塑其身份认同、适应当地文化的同时,仍然会维持原有的文化价值,在迁入地形成多元共存的社会文化(Portes et al., 1980)。这些针对跨国移民和少数族裔的理论与研究框架都为探索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提供了重要参考。国内不少学者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合或市民化提出了不同的定义与测量维度。如Wang等(2012)认为社会融入应当包括经济、社会与文化、身份认同三方面,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融合有助于流动人口归属感与身份认同的形成;周皓(2012)认为收入与住房、语言与外表、心理观念、社会交往与参与、互动与接纳等对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至关重要,并归纳得出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的五维度;杨菊华(2018)认为市民化可以大致归纳为角色身份、公民权利、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4个维度,各个维度之间相互渗透,制约或推动各维度的发展。尽管学界对市民化尚未有一套系统的测度体系,但不同学者对市民化的测度具有一定共性,主要可以概括为4个维度:经济融合、社会文化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

经济融合主要包括就业状态和经济收入,是指个体获得稳定的收入和平等的就业机会,是其立足于城市社会之本;社会文化适应包括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是指个体对所处的城市社会新环境的适应和对自身行为与思想的调整;结构融合主要以社会交往与参与为标志,指个体社交网络的向外扩展和社会资本的多元化积累,充分反映了个体融入城市社会的程度;身份认同则主要是指个体对自我身份

的认识和情感归属,以及其身份认同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接纳,是其融入城市社会的核心(杨菊华, 2009; 2018)。

当前大部分市民化研究主要聚焦于乡-城流动人口和城郊失地农民两类城市弱势群体(王桂新等, 2008; 杨菊华, 2009; 黎智辉等, 2013; 梁梦鸽等, 2014; 应婉云等, 2015; 申明锐等, 2016)。已有研究表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排斥、人力资本匮乏、社会资本不足、社会参与缺失和外界的歧视等结构性和主体性因素共同导致了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的缓慢(王春光, 2006; 任远等, 2012; Yang, 2013; 杨菊华, 2015); 尽管城乡二元制度和劳动力市场等结构性因素起一定制约作用,但失地农民自身的主体性因素(如心理认同、角色意识等)才是制约其完全转变为市民的主导因素(李永友等, 2011; 文军等, 2011; 冯健等, 2017)。随着城中村改造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大规模推进,有学者开始关注城中村村民在改造后的市民化进程问题(刘晔等, 2012; 阮梅洪, 2014; 王娟, 2015; 叶裕民, 2015)。但该类研究多局限于对改造后村民市民化进程现状的陈述,缺乏运用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在更深的制度与社会文化层面上分析村民市民化困境的根源。

近年来,有学者从中微观层面出发,运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出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系统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合与市民化问题,过往的研究认为,人口的流动与迁移冲击着人们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得由各种社会关系网络所构成的场域处于一种动态更新的状态;而在特定场域内长期形成的具有特定群体属性的惯习使人们往往表现出稳定的心理和行为倾向,并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入形成了阻碍,实际上,社会融合与市民化就是人们的惯习与场域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张慧等, 2014; 肖云等, 2015; 张红霞, 2019; 唐云锋等, 2019; 祝仲坤等, 2019)。在布迪厄的理论框架中,场域、资本与惯习是其解释个体实践活动的3个重要工具概念(Bourdieu, 1977)。个体的实践活动往往同时受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双重影响,只有将个体置于其所处的特定社会空间中,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相结合,跨越“行动—结构”的二元对立(谢小芹, 2019),才能充分理解其行动与决策的逻辑,避免陷入基于现状陈述的循环论证中。在城市发展中,城中村这类都市村社共同体呈现出有别于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的

发展路径，推倒重建式的城中村改造重构了既有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复建房社区这一特殊场域对于村民资本与惯习的变化仍有待深入考究。因此，本研究以猎德——广州首个整体改造的城中村为例，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出发，旨在解决以下问题：在经济融合、社会文化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4个维度上村民的市民化水平如何？什么原因导致了村民市民化进程滞后？以期为推动城中村改造、促进改造后的村民市民化进程、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1 研究案例与资料来源

1.1 猎德改造和猎德复建房社区

猎德地处广州市中心城区（图1），由于城市空间的扩展，1994年猎德村的农田已被全部征用于珠江新城建设，完全转变为“都市中的村庄”。2002年，猎德村成立猎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实现撤村改制。2007年10月，猎德村开始全面拆迁改造，

成为广州市首个进行整体改造的城中村。2010年，项目顺利完工并实现回迁，改造后的猎德复建房社区由37栋26~42层不等的高层住宅组成，逾6000套的回迁房中有2/3可供出租，吸引了周边上班的白领一族以及早年迁出猎德的广州市民入住。改造前，全村户籍人口为7865人，共计3167户，外来人口约合10000人（刘晔等，2012）。2018年，猎德社区有户籍人口7329人，共计3035户，占社区总人口的46.5%；流动人口8449人，占53.5%。与改造前相比，改造后新入住的群体普遍拥有更高的学历和经济收入，猎德村改造不仅带来了物质环境的提升，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空间与社会结构的变化。

1.2 资料来源

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采用描述性统计和质性分析开展研究。资料来源于课题组2013年3月在猎德复建房社区开展的问卷调查，采用入户调查和代填式问卷调查的形式，根据门牌号随机抽取入户家庭，并在每个家庭中随机抽取受访者。最终派发问卷280份，回收有效问卷271份，有效率96.79%，其中猎德村民（即在征地后仍保留村籍者）共98人。此外，课题组于2011年3月至2018年2月期间，在猎德复建房社区开展长时序的跟踪调查，并通过滚雪球的方法选取调查对象，最终完成39份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对象包括社区工作人员、猎德村民、社区内的其他业主和租户（包括广州市民和外来人口）。访谈对象年龄为18~81岁，并且在猎德复建房社区居住时间≥3个月。由于大部分村民对外界存在较强的防备心理，参与长期跟踪调查的意愿不高，因此难以开展第二轮问卷调查来对比前后数据。

2 “场域-资本-惯习”与猎德村民市民化

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客观系统，社会的高度分化形成了许多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场域，一个场域就像一种游戏，有其独特的运作逻辑（图2）（Bourdieu et al., 1992）。在每种“社会游戏”中，个体所拥有的资本是其在场域中竞争力量的象征，这些资本可以进一步地细分为经济、文化、社会 and 象征性资本4种类型。由于场域的相对独立性和运作逻辑的差异，不同的资本在不同场域内的价值有所差异，而个体之间的资本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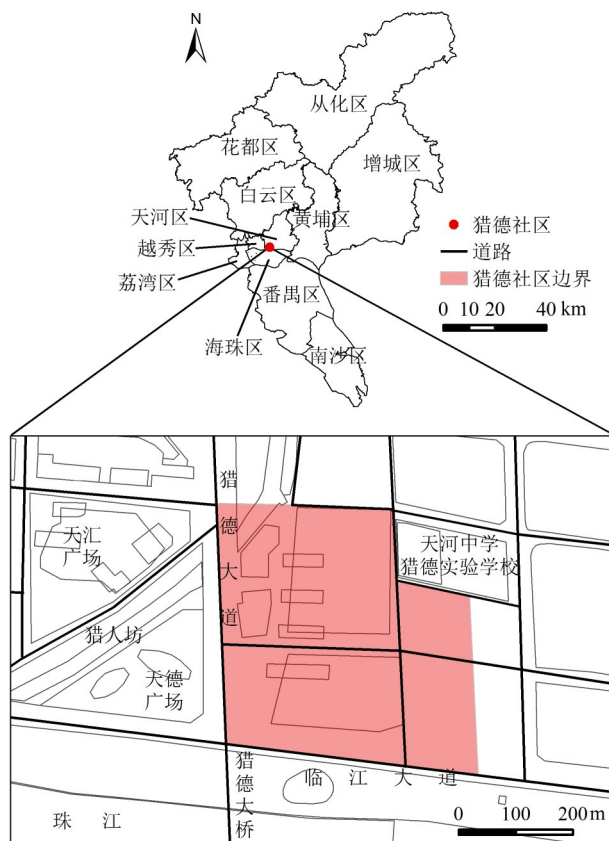


图1 广州猎德复建房社区区位

Fig.1 Location of the Liede Redeveloped Community, Guangzh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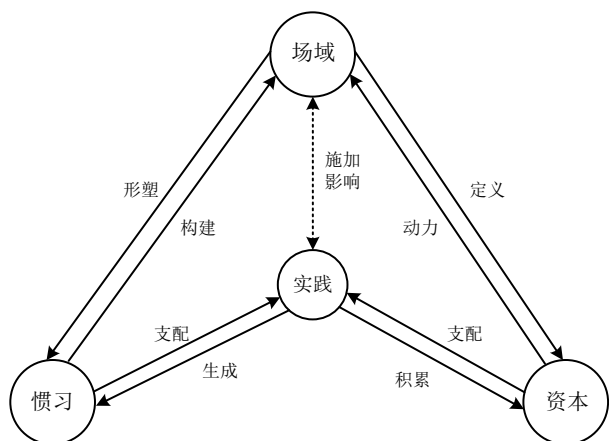


图2 场域理论的基本框架

Fig.2 The Framework of Bourdieu's Field Theory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 Bourdieu 等（1992）整理并自绘。

推动了场域的运作。资本的数量与结构支配着个体的行为与决策。同时，个体通过实践维持或增加资本，改变自身在场域中的权力关系和地位，并且对场域的结构以及运作逻辑施加影响；个体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地形成行为倾向系统——惯习，从而使得惯习和场域处于持续更新的状态之中。与“习惯”不同，惯习更加强调个体行为特征背后的文化与结构性因素（孙炳耀，2013）。场域总会潜移默化地对个体施加影响，在场域的塑造下惯习将社会结构与制度身体化，并通过感知、思维、行动逻辑等无意识地支配实践活动，使得个体的实践活动往往受限于所处的社会背景（Bourdieu, 1990）。惯习、资本与场域三者间的互动构成了个体实践活动的逻辑（崔思凝，2017）。

对于已完成城中村改造并原址回迁的猎德村民而言，复建房社区是具有地域性、社会性的特殊场域，是村民融入城市社会的组织载体和社会空间场域（唐有财等，2017；唐云锋等，2019；祝仲坤等，2019）。村民市民化进程的四维度——经济融合、社会文化适应、结构融合、身份认同分别与布迪厄所提出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惯习、社会资本、象征性资本相对应；市民化四维度的变化与城中村改造和社区组织结构的变更密不可分。只有将村民置于他们所处的社区场域中，同时考虑到宏观环境、结构、个体能动性要素，分析村民在场域内的资本与关系结构，才能更好地把握村民的行动与实践逻辑，探讨改造后村民的市民化问题。

2.1 场域——村社共同体的延续

都市村社共同体是城中村村民等已进入城市生活的特殊群体权利高度附着独特场域，也是城中村村民实现市民化的重要“新型社会空间”（蓝宇蕴，2005）。回迁后居委会与街道办分担了部分社会与党群职能，承担起社区居民的民政与民生工作，不断完善猎德村民的社会保障，确保村民作为城市居民的基本权益。然而，猎德村民对村社共同体这一场域仍然具有高度依赖性，并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基层管理架构和社区服务方面，猎德村于2002年成立猎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并建立居委会，并在回迁后由猎德集体公司成立锡惠物业管理公司，但集体公司至今依然承担着社区管理与建设、社区服务以及学校建设等工作，并在社区管理费用方面给予村民优惠。在村民的生计来源方面，猎德村改造后，村民的就业和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猎德集体公司。猎德集体公司旗下的锡惠物业管理公司仅面向村民招工，吸收了村内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极大地缓解了村民的就业难题；同时，村集体分红在改造后大幅提升，成为了许多失业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为村民的生活提供了经济保障。尽管居委会、村集体公司和物业管理公司分担了不同的社区管理与服务职能，但实际上物业管理公司在资金运作、组织架构等方面依然依附于村集体公司，且村民对三者的职能分工较为模糊，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时仍然首先向村集体公司寻求帮助。在改造后，这种拟家长制的全面关怀以及利益相关型的模式依然延续下来，并通过城中村改造注入了新的活力，村集体物业的业态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使得村集体收入与村民分红大幅上涨，同时，村集体旗下的物业管理公司承担了社区的大部分职能，使得村民与村集体的关系更加难以割裂，对村集体仍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依赖性。尽管场域具有自我调节与更新的能力，但这种排他性和封闭性较强的利益共同格局使其缺乏社会延展性，在城中村改造的冲击下依然延续着过往村社共同体的特定行动逻辑（蓝宇蕴，2001）。尽管在市民化初期，村社共同体在复建房社区的延续有助于村民适应并融入城市生活，实现角色转型的顺利过渡。但从长远来看，这样的机制并不利于村民突破目前所遇到的市民化发展瓶颈。

2.2 资本——积累不足与转化不畅

2.2.1 经济资本 经济资本是指能够快速且直接转

化为金钱或以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资本，主要包括收入和财产两种形式（Bourdieu, 1986）。猎德村改造之后，村民的财产性收入（包括分红、房屋租金等）大幅增加，但其工资性收入在改造之后没有显著提升。这是因为：一方面，村民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足，导致他们只能从事次属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工资性收入普遍处于较低的水平；另一方面，改造后财产性收入的大幅提升，抑制了村民到社区外参与工作的积极性（刘晔等，2012）。此外，由于村民选择保留复建房的集体土地性质，产权固有的残缺性使得村民所拥有的房产存在流通性较差的问题（Li et al., 2014），村民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出售自家房产，其房产难以变现为可流通的经济资本。

2.2.2 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行动者对某种文化资源的占有，从而使得自身在再生产社会等级的过程中占据优势；其不仅包括对个体的教育与培训投资，更涵盖了早期家庭教育对个体发展的决定性影响（Bourdieu, 1986；宫留记，2010）。

在学校教育与培训方面，与市民相比，猎德村民缺乏良好的教育，学历普遍较低，就业技能不足。尽管政府曾经在改造后为猎德村民提供过技能培训，但多数村民没有意识到再教育的重要性，对参与培训缺乏积极性，导致许多村民在改造多年后依然深陷“素质低—就业难—收入低—文化资本投资低”的恶性循环，这在40岁以上村民身上尤为突出。尽管40岁以下、已步入社会工作的村民大都意识到教育是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但受到祖辈文化资本缺失以及观念延续的影响，他们难以仅仅通过再教育以及就业晋升为中产阶级。

与学校教育不同，早期家庭教育不仅是一种后天的自我积累，更取决于出身家庭的文化资本厚度和质量，是一种具有鲜明阶级色彩的代际传承（朱伟珏，2007）。显然，受早期家庭教育影响的文化资本不是城中村改造这一特殊事件就能够轻易改变的。对于已踏入社会工作的猎德村民而言，他们出身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相对匮乏，父母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较低，他们从原生家庭积累和传承的大多数是具有小农意识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而这类文化资本无助于村民市民化的提升，更无法通过城中村改造实现根本性的转变，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的改变更多地依赖于与市民群体的密切接触和互动交流。

2.2.3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指个体通过已制度化

的相互认知的持续性社会网络，获得实际或潜在的社会资源（Bourdieu, 1986）。根据社会网络成员的同质性/异质性，帕特南（Putnam, 2000）将社会资本分为黏合性（bonding）和连接性（bridging）两种类型：黏合性社会资本有助于保持现状，但同时也将个体限制在小范围的社会圈内；而连接性社会资本有助于获得更多资源。对于猎德村民而言，虽然全面改造对其原有的社会网络造成了冲击和破坏（陶伟等，2015a；2015b），但原址回迁的改造模式以及排他性较强的社区活动使村民能够快速重新构建基于血缘关系的社会网络，不断强化同村宗亲内部的黏合性社会资本。然而，以地缘或血缘等初级社会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交往，使得村民在日常生活中较少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打交道，难以积累连接性社会资本，其实质依然是乡土性而非城市性的（唐云锋等，2019）。狭窄的社会接触从长远来看保留了村民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阻碍了村民的市民化进程。尽管猎德改造为村民提供了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市民打交道的机会，但由于村民和市民之间在心理上仍然存在着一堵“看不见的墙”，而且市民极少参与到社区活动中，因此村民与市民的毗邻而居并不会实现村民连接性社会资本的积累。

2.2.4 象征性资本 象征性资本是由其他资本转化而成的一种无形的资本，包括了个人的名誉、信用等多种形式（Bourdieu, 1977；1990）。在回迁之后，猎德村民的社会形象总与“土豪”等负面标签相连，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下形成了社会舆论对村民身份的“污名化”。除了贴标签以及形象的固化外，污名化更会导致群体的隔离、地位丧失以及歧视（Link et al., 2001）。猎德村民的象征性资本因社会的污名化而遭到贬损，单一的负面标签在心理层面将村民推向城市社会的边缘，在完成改造后，他们依然没有感受到主流社会的充分尊重以及对其市民身份的认可，使得村民在情感上与城市社会疏离，对其社会身份含糊不清。

2.3 惯习——自我驱动的匮乏

惯习是一种结构形塑机制，是社会结构在个人身上长期积淀的结果，并且能够自由地生产思想、感知、行为等产品（Bourdieu, 1990）。虽然惯习具有稳定的特质，但并非恒久不变，个体通过实践经验捕捉社会变迁，潜移默化地对惯习产生影响。

相对于迅猛的社会变迁，惯习的变化具有滞后性，惯习会基于历史的社会结构以及过往的实践经

验,对外界的刺激进行过滤和筛选,从而构建感知与行动的框架,表现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和行为倾向(Bourdieu, 1977)。猎德改造回迁后,年纪较大的村民依然固守原有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这是因为随着年岁的增长,个体的身心图式对外界刺激的敏感度会不断降低。惯习还具有“场域根植性”,当惯习脱离了原来的场域后就可能会产生“不合拍”的问题。村社共同体的延续使得猎德村民的惯习在回迁后并未出现明显不适,在社区这一特定范围内,他们原有的一套行动逻辑仍是可行和合理的,原地安置并整体回迁的改造模式没有催生出村民自我更新的迫切需求。除此之外,在以惯习为基准的理性选择中,人们会保护自己,使自己尽可能处于一个预先适应的环境中(Bourdieu, 1990)。改造后,村民的经济决策、交往对象的选择等等都是一种安全策略,是村民在改造的冲击下为自己划定的保护圈,但保护圈限制了村民与城市社会的信息和资本交换。但同时,猎德村改造改变了原本的社会环境与结构,使得部分村民在城市化的冲击以及市民群体的示范作用下,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发生一定转变,逐渐向市民角色靠拢。

3 猎德村民市民化水平分析

城中村村民市民化是多层面全方位的进程,从经济融合、社会文化适应、结构融合以及身份认同4个维度,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和访谈材料,对村民的市民化现状进行深入分析。

3.1 经济融合层面

从表1来看,在经济收入方面,得益于改造带来的居住环境改善,41.80%的受访村民选择将物业出租,村民的房屋租金收入平均可达6 301.20元/月,较改造前的每户800元/月有大幅上涨;同时,由于集体物业的业态提升,村集体年收入也从改造前的1亿元提升至5亿元,有村籍者平均每年可获得16 912.70元的集体分红。但由于受教育年限以及再教育培训的参与度较低(11.40 a; 20.40%),猎德村民在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仍然处于劣势地位。例如,许多村民只能从事社区保安、快递员等专业化程度低、可替代性强的工作,人均家庭月收入仍处于较低水平(3 642.30元)。此外,改造所带来的房屋租金上涨也助长了村民好逸恶劳的心态,许多40岁以上、仍具有劳动能力的村民选择以出租房屋谋生。在猎德村民中,个体户/自由职业者/食利者和无就业者各占近1/3,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

表1 2013年猎德村民的基本特征与市民化状况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and citizenization of villagers from Liede

指标	均值/占比
样本容量	98
平均年龄/岁	44.40
性别/%	男 40.80 女 59.20
婚姻状况/%	已婚 77.60 未婚/离异/丧偶 22.40
年均分红收入/元	16 912.70
房屋出租情况/%	无 58.20 有 41.80
月均收取总租金/元	6 301.20
受教育平均年限/a	11.40
技能培训/%	参加过 20.40 未曾参加 79.60
职业/%	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2.00 专业技术人员 11.20 办事人员 6.10 商业服务业人员 5.10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 0.00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4.10 个体户/自由职业者/食利者 34.80 无就业 36.70
人均家庭月收入/元	3 642.30
社区公共活动参与(1~5)	1.98
交往意愿(1~5)	3.91
对村民生活方式的看法/%	完全一样 34.69 很多方面一样 46.94 很多方面不一样 15.31 完全不一样 3.06
日常生活求助对象/%	家人 32.29 亲戚 33.34 邻居 20.83 同学/朋友 13.54
现居住地/%	同一家庭 15.62 猎德社区 72.92 广州市内,猎德社区外 11.46
对村民身份的看法/%	农民 13.27 市民 61.22 说不清 25.51
经济状况自我评价/%	变好 64.29 没有变化 31.63 变差 4.08
社会地位自我评价/%	变好 29.59 没有变化 70.41 变差 0.00

注: 1) 社区公共活动参与程度通过“您认同‘我经常参与社区的公共活动’的说法吗”进行测度; 2) 交往意愿通过“您愿意与广州市民交往吗”进行测度。

食利一族。

3.2 社会文化适应层面

在行为方式方面,有81.63%的受访村民认为其生活方式与市民群体相同或相近,这与村民和其他社会群体的长期接触密切相关。在改造之前,由

于猎德村良好的区位条件，猎德村民能够在与广州市民的接触中逐渐习得市民的角色行为；而城中村改造使居住群体发生了较大变化，新住户的个人素质、学历等各个方面均有所提高，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为猎德村民起良好的示范效应。但在访谈过程中，不少年纪较大的村民也表示，一些固化的生活习惯依然难以改变，短时间内他们难以消除农民身份的烙印，与市民的角色行为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年轻人的适应能力强，而且我们这里都是城市中心，所以他们比较容易融入城市，他们的生活方式各方面都和市民一样了。我们老一辈始终耕过田，许多方面都很难适应改变。”（No.7，猎德村民林女士，55岁，2011-04-05）

通过社会接触以及集体社会化等途径，个体能够从邻居习得社会规范，从而改变自身的日常行为方式（Galster, 2012）。与行为方式不同，价值观念的改变与形成难以通过简单的观察与模仿实现，对于猎德村民而言，与社区内其他群体的互动和交往有助于其接受现代化的观念与思维方式，促进观念的更新与转变：

“现在很多出去的亲戚都回来了。比如我表哥就是重新搬回来住的。很多事情我都会向表哥请教，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比我们这些‘洗脚上田’的农民懂得更多。他们确实比我们考虑得更全面、更长远。之前村里鼓励我们购买养老保险，我本来是不想买的，交那么多钱等到老了才可以领养老金。但是，我的堂姐（回迁后搬入的新居民）就劝我买。现在想想，还好当时买了，起码以后每月可以领几百块，儿女的负担没那么重。”（No.14，猎德村民梁先生，44岁，2011-03-10）

尽管新迁入的大部分广州市民和外来人口与猎德村民之间关系较为淡薄，但部分早年迁出猎德后又迁回的市民群体由于亲缘或原有地缘关系，与猎德村民保持着良好的互动与交往，潜移默化地向村民传达渗透现代化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

3.3 结构融合层面

在社区参与方面，猎德村民的公共活动参与度处于较低水平（1.98），这主要由于改造回迁之后，社区内的公共活动大幅减少。在社会交往方面，猎德村民与广州市民的交往意愿较高（3.91），在主观上存在着较强的结构融合意愿。然而，各群体之间仍存在固有的观念差异并且缺少互动接触机会，仅有的社区活动如划龙舟、开年饭等仅面向猎德村民及其亲友，具有较强的内倾性和排外性，大部分居

住在复建房社区但不具有村籍的社区居民难以参与其中，村民和市民等新住户的居住混合未能实现不同群体社会网络的相互融合：

“我觉得这个社区有个很严重的问题：整个社区分成了两个群体——村民和租户。两个群体之间好像有一道隔阂，彼此间没有信息的交流。譬如划龙舟这些活动，都是村民那边搞的。他们其实可以邀请整个小区的人一起参加。我们发现参加这些活动的人都是村民以及他们的亲友，像我们这些租户根本没人邀请。村民的群体比较封闭，只有通过各种社区活动使得社区关系变得融洽，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No.23，外来人口孔先生，35岁，2012-04-22）

“我觉得我和本村的人交往还是有困难的。最主要的因素是观念和心态上的不同。他们更讲究这种传统的宗亲关系和地域关系，认识的大多数都是本村的人。我平时在电梯里面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会有回应；但如果要有深层次的交往，这就十分困难了。”（No.24，广州市民张女士，56岁，2013-03-17）

村民的社会网络在回迁多年之后仍立足在宗亲关系之上，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有65.63%的受访村民选择向家人或亲戚寻求帮助，其中有88.54%的对象居住于同一家庭或社区，村民的日常社会交往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并且依附于社区中，未能通过城中村改造实现社会网络的向外拓展与深化：

“来这里租屋的人都是白领人士，都是自己走自己，不会跟你打招呼；有个别有礼貌的人会打打招呼，借东西也会，但是都很少。人际关系演变不大的，往来基本都是原来的村民。”（No.27，猎德村民古先生，35岁，2018-02-23）

3.4 身份认同层面

在社会身份方面，超过60%的猎德村民认同自身的市民身份，但仍有25.51%的受访村民难以判断自身的社会身份。这些村民对身份的认识模糊主要由于“损失厌恶”的心态，在改造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村民普遍对政府、开发商和村委不信任，认为政府和村集体在土地征收和改造的过程中获取了高额的收益，侵占了自身利益；随着周边地区的快速建设与发展，村民的“损失厌恶”感愈发强烈，抑制了村民向市民角色转变的主观能动性，只是被动地接受和适应新角色（谭肖红等，2012；阮梅洪，2014）。同时，农民身份的附

着利益已日渐超越市民,城市居民户口的吸引力已不如过往,村民转变为市民角色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也大幅削弱。此外,村民的社会地位未能与经济状况实现同步提升,有64.29%的猎德村民认为改造带来了自身经济状况的改善,但70.41%的猎德村民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改造后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尽管村民在改造后获得了经济补偿,但由于人力资本的匮乏,以职业身份为标志的社会地位难以在改造后实现跃升(Qian, 2017)。

4 结论与建议

从基于“场域—资本—惯习”的场域理论框架来看,猎德复建房社区是“新”村社共同体这一特殊场域的实体空间,是村民融入城市生活的社会空间场域,城中村改造为社区管理模式等带来了新变化,但村集体公司未能在改造后实现“减负”,承担了大量与村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区服务和生计保障职能,所设立的物业管理公司实际上未能剥离村集体公司所承担的社区管理和服务职能,处处延续着过往由村集体公司主导的运作体系。村民与村集体形成了排他性、封闭性较强的利益共同格局,村民的各类资本高度依附于“新”村社共同体中。同时,村民面对社会转型时在行动与决策上寻求安全策略,“守护型”的经济策略和同质化的社会网络等因素导致其资本结构与数量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场域的结构在实质上并未随着物质空间的改造而发生重构,各方利益群体的资本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状态,并未催生出村民主动适应新环境、重新构建场域结构的内生动力,其惯习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尽管村民在改造回迁后已基本完成外部“赋能”,实现基本市民权益的保障和居住空间的转移,并且居住群体的更替及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为村民带来了良好且持久的示范效应,使得村民的市民角色意识、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方面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从市民化的4个维度来看,迄今许多村民尚未实现自我“增能”、主动融入城市社会:在经济融合层面,就业难题未能从根源上得到解决;在社会文化适应层面,年轻一辈能够快速适应城市社会,但老一辈村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固化;在结构融合层面,村民与其他群体缺少交往互动的平台,其社会网络难以向外拓展;在身份认同层面,村民的社会地位没有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而提升,对市民角色的认识不足。

猎德村改造以广州市举办2010年亚运会为契机

得以快速并顺利推进,尽管其改造模式和实施流程与其后的浔村、杨箕村等改造项目较为相似,但该项目的实施效率不可复制。“猎德模式”不仅被社会各界诟病为“造富”运动,也因其过高的容积率、不合理的楼宇设计和村民与城市生活的不相融而引起担忧,但作为广州市第一例由开发商介入的城中村改造项目,猎德村改造依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谭肖红等, 2012; 黄文炜等, 2015)。各地和各村的改造模式都因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治理方针、市场参与程度、村集体组织能力等而有所差异,与“政府主导,村为主体,市场参与”的“猎德模式”相比,在“政府引导,开放商与村民和村集体联盟”的珠海山场村案例和“第三方”群体参与的深圳湖贝古村案例中,村民和村集体以及非利益相关者的第三方具有更强的参与性和积极性,维护自身与公共利益的意识有所提升,也更加重视改造的社会意义(郭友良等, 2017; 刘强等, 2019; 张泽宇等, 2019; 章征涛等, 2019)。近年来,广州掀起了第二轮城中村改造的热潮,无论是三元里等城中村的微改造模式,还是沥滘、笔村等地的全面改造模式,城中村改造都应当充分考虑村民当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发展,以村民的市民化和基层组织管理架构的转型作为改造的根本目的。改造后的安置模式、社会福利与保障措施等都对村民适应并融入城市社会具有深远影响(Qian, 2017)。

对于城中村村民而言,他们目前难以凭借自身能力和“类单位”式村集体经济的照顾突破市民化的发展困境。因此,政策制定者和规划工作者应当把城中村村民市民化当作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多方面地推进村民的市民化进程:1)推进村社共同体的转型,促进村集体公司的角色转变,打破以村集体公司为主体的相对封闭的管理方式,调整机构设置,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社区管理工作中,促进社区组织和管治形式的转型,减少村民对村集体公司的依赖;2)积极开展社区活动,搭建互助互惠、平等交流的沟通平台,鼓励原村民、新业主和租户等不同群体共同参与,使得村民在广泛的社会参与和人际交往中提升社会资本,在日常的往来和接触互动中习得市民角色的行为规范,潜移默化地对其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产生影响;3)为村民子女提供优质的师资力量,同时为失业村民提供多种类型的再就业培训课程,并且将培训效果与村集体分红挂钩,充分调动村民学习的自主性,切实提升村民的文化资本;4)营造宽容的社会环境,

广大市民以及社会舆论应当加强对村民的全面认识,提升村民以及村集体的正面形象;5)政府及社区基层组织应当充分意识到村民维权意识的觉醒和居民身份地位的多元化,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应当更多地听取村民、新业主和租户的声音,鼓励不同群体为社区建设建言献策,提升社区内所有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培育市民精神;6)在制定城中村改造方案时政府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兼顾公平与效率,鼓励村民、村集体、第三方社会组织、开发商等多元主体共同协商对话,促进多方社会力量有效参与到城中村的空间改造与再生产中,充分考虑到物质空间、经济、社会、管理等多方面因素,兼顾改造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城中村村民的市民化是一项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但政府、新闻媒体、学者等社会各界对城中村改造后的社会问题与综合评估缺乏持续关注(谭肖红等,2019)。尽管课题组于2011—2018年期间在猎德复建房社区开展长时序的跟踪调查,但由于村民参与长期跟踪调查的意愿不高,因此所获取的调查样本较少,个体差异可能会对本研究的有效性和代表性产生影响,同时也使得本研究难以展开前后对比,探索村民的市民化进程。近年也有学者从个体生命历程出发,将宏观的城镇化与微观的市民化相结合,多角度地探讨市民化问题(冯健等,2017)。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都有着时代变迁的烙印,人生中的转变都有可能反映出市民化的进程,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从个体的视角出发,打破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隔阂,关注城镇化洪流中每一个个体及其背后的故事,切实推进“人的城镇化”。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Bourdieu P and Wacquant L J D.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Richardson J G.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崔思凝. 2017. 惯习、资本与场域:布迪厄实践理论及其对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研究的启示. 湖北社会科学, (9): 22-27. [Cui Sining. 2017. Habitus, Capital and Field: Bourdieu's Theory of Practice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Processes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Hubei*, (9): 22-27.]
- 冯健, 叶竹. 2017. 基于个体生命历程视角的苏南城镇化路径转变与市民化进程. 地理科学进展, 36 (2): 137-150. [Feng Jian and Ye Zhu. 2017.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Citizenization in Southern Jiangsu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Course. *Progress in Geography*, 36(2): 137-150.]
- Galster G C. 2012. The Mechanism(s) of Neighbourhood Effects: 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In: Van Ham M, Manley D, Simpson L, Bailey N and MacLennan D. *Neighbourhood Effects Research: New Perspectives*. Heidelberg: Springer, 23-56.
- Gordon M M.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宫留记. 2010. 资本: 社会实践工具——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Gong Liuji. 2010. *Capital: A Tool of Social Practice: Capital Theory of Bourdieu*.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郭友良, 李郁, 张丞国. 2017. 广州“城中村”改造之谜: 基于增长机器理论视角的案例分析. 现代城市研究, (5): 44-50. [Guo Youliang, Li Xun and Zhang Chengguo. 2017. The Myth of Urban Village Redevelopment in Central Guangzhou: A Case Study in the Perspective of Growth Machine Theory. *Modern Urban Research*, (5): 44-50.]
- 黄文炜, 袁振杰. 2015. 地方、地方性与城中村改造的社会文化考察——以猎德村为例. 人文地理, 30 (3): 42-49. [Huang Wenwei and Yuan Zhenjie. 2015. Place, Placeness and the Socio-Cultural Investigation on Urban Village Re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Liede Village. *Human Geography*, 30(3): 42-49.]
- 蓝宇蕴. 2001. 非农化村庄: 一种缺乏社会延展性的社区组织. 广东社会科学, (6): 137-142. [Lan Yuyun. 2001. Non-Agricultural Village: A Kind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Lacking Social Extensibility.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6): 137-142.]
- 蓝宇蕴. 2005. 都市里的村庄: 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Lan Yuyun. 2005. *Villages in the City: A Case Study of a New Community of Villages and Societies*. 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黎智辉, 黄瑛. 2013. “半城市化”与“市民化”——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正式移民问题研究. 规划师, 29 (4): 32-36. [Li Zhihui and Huang Ying. 2013. Semi-Urbanization and Citizeniz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in New Urbanization. *Planners*, 29(4): 32-36.]
- Li L H, Lin J, Li X and Wu F. 2014. Redevelopment of Urban Village in China—A Step towards an Effective Urban Policy? A Case Study of Liede Village in Guangzhou. *Habitat International*, 43: 299-308.
- 李永友, 徐楠. 2011. 个体特征、制度性因素与失地农民市民化——基于浙江省富阳等地调查数据的实证考察. 管理世界, (1): 62-70. [Li Yongyou and Xu Nan. 2011. Individual

- Characteristics,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Citizenization of Land-Lost Peasant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Survey Data in Fuyang and Other Places, Zhejiang. *Management World*, (1): 62-70.]
- 梁梦鸽, 李俊峰. 2014. 国内外失地农民城市融合及保障制度综述. 热带地理, 34 (2): 259-265. [Liang Mengge and Li Junfeng. 2014. Review of the Lost Land Farmer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Urban Integration in China and Abroad. *Tropical Geography*, 34(2): 259-265.]
- Lin G C S. 2015. The Re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struction Land: Practising Land Property Rights in Cities through Renewals. *The China Quarterly*, 224: 865-887.
- Link B G and Phelan J C. 2001. Conceptualizing Stigma. *Annual Reviews*, 27(1): 363-385.
- 刘强, 王勇, 周凯琦. 2019. 逆转与嬗变: 城中村认知与改造研究演进. 现代城市研究, (8): 41-48. [Liu Qiang, Wang Yong and Zhou Kaiqi. 2019. Reversal and Transmutation: Evolution of Cogn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Villages. *Modern Urban Research*, (8): 41-48.]
- 刘宣. 2010. 快速城市化下“转型社区”空间改造的障碍——广州、深圳案例. 地理研究, 29 (4): 693-702. [Liu Xuan. 2010. On the Hampers of Redevelopment of 'Transitional Community' under the High-Speed Urbanization in China: Cases in Guangzhou and Shenzhe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9(4): 693-702.]
- 刘晔, 刘于琪, 李志刚. 2012. “后城中村”时代村民的市民化研究——以广州猎德为例. 城市规划, 36 (7): 81-86. [Liu Ye, Liu Yuqi and Li Zhigang. 2012. Citizenization of Native Villagers after Redeveloped Urban Village: A Case Study of Liede Community, Guangzhou. *City Planning Review*, 36(7): 81-86.]
- Park R E. 1939. *The Nature of Race Relations*. In: Thompson E T. *Race Relations and the Race Proble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Portes A, Parker R N and Cobas J A. 1980. Assimilation or Consciousness: Perceptions of U.S. Society among Recent Latin American Im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Forces*, 59(1): 200-224.
- Portes A and Zhou M. 1993.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30(1): 74-96.
- Putnam R.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Qian Z. 2017. Resettlement and Adaptation in China's Small Town Urbanization: Evidence from the Villagers' Perspective. *Habitat International*, 67: 33-43.
- 任远, 陶力. 2012. 本地化的社会资本与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人口研究, 36 (5): 47-57. [Ren Yuan and Tao Li. 2012. Localized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36(5): 47-57.]
- 阮梅洪. 2014. 义乌市城中村村民和进城农民工市民化比较研究. 城市发展研究, 21 (11): 16-23. [Ruan Meihong. 2014. A Comparative Study on Citizenization between Villagers Who Live in the City and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Yiwu.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1(11): 16-23.]
- 申明锐, 张京祥. 2016. 基于“城市性”的流动人口城市化探讨——以扬州城北拖砖人为例. 城市规划, 40 (4): 61-68, 84. [Shen Mingrui and Zhang Jingxiang. 2016. Urbanism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and Their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Brick Porters in Northern Yangzhou City. *City Planning Review*, 40(4): 61-68, 84.]
- 孙炳耀. 2013. 对居民社区行动场域的理论解析.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5 (6): 18-24. [Sun Bingyao. 2013. Interpretation of Community Action in Perspective of Field Theory. *Journal of HIT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5(6): 18-24.]
- 谭肖红, 袁奇峰, 吕斌. 2012. 城中村改造村民参与机制分析——以广州市猎德村为例. 热带地理, 32 (6): 618-625. [Tan Xiaohong, Yuan Qifeng and Lv Bin. 2012. Analysis of the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of Villagers in Urban Village Re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Liede Village in Guangzhou City. *Tropical Geography*, 32(6): 618-625.]
- 唐有财, 侯秋宇. 2017. 身份、场域和认同: 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32 (3): 1-10. [Tang Youcai and Hou Qiuyu. 2017. Citizenship, Field and Identity: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f Migrant Population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Analysis. *Journ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2(3): 1-10.]
- 唐云锋, 刘涛, 徐小溪. 2019. 公共场域重构、社区归属感与失地农民城市融入.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36 (4): 78-85. [Tang Yunfeng, Liu Tao and Xu Xiaoxi. 2019. Public Field Reconstruction, Community Ownership and Urban Integration of Landless Peasant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6(4): 78-85.]
- 陶伟, 程明洋, 符文颖. 2015a. 城市化进程中广州城中村传统宗族文化的重构. 地理学报, 70 (12): 1987-2000. [Tao Wei, Cheng Mingyang and Fu Wenying. 2015a. Reconstruction of Guangzhou Urban Villages' Traditional Lineage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From Spatial Form of Ancestral Hall to Behavioral Patterns of Villager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0(12): 1987-2000.]
- 陶伟, 叶颖. 2015b. 定制化原真性: 广州猎德村改造的过程及效果. 城市规划, 39 (2): 85-92. [Tao Wei and Ye Ying. 2015b. Customized Authenticity: Processes and Effects of Liede Village Reconstruction in Guangzhou. *City Planning Review*, 39 (2): 85-92.]
- Wang W W and Fan C C. 2012. Migrant Workers' Integration in Urban China: Experiences in Employment, Social Adaptation, and Self-Identity.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3(6): 731-749.
- 王春光. 2006.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 社会学

- 研究, (5): 107-122, 244. [Wang Chunguang. 2006. Research on the "Semi-Urbanization" of Rural Migrants. *Sociological Studies*, (5):107-122, 244.]
- 王桂新, 沈建法, 刘建波. 2008. 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 人口与发展, 14 (1): 3-23. [Wang Guixin, Shen Jianfa and Liu Jianbo. 2008. Citizenization of Peasant Migrants during Urbanization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14(1): 3-23.]
- 王娟. 2015. 基于村民满意度的城中村改造评价——以郑州市1425份村民调查样本为例. 规划师, 31 (S2): 268-271. [Wang Juan. 2015. Evaluation of Urban Village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Villagers Satisfaction: 1425 Villagers' Survey Samples in Zhengzhou. *Planners*, 31(S2): 268-271.]
- 文军, 黄锐. 2011. 超越结构与行动:论农民市民化的困境及其出路——以上海郊区的调查为例.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51 (2): 18-24. [Wen Jun and Huang Rui. 2011. Beyond Structure and Action: the Plight and Outlet of the Citizenization of Peasants: A Case Study of Suburb in Shanghai.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51(2): 18-24.]
- 肖云, 邓睿. 2015.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困境分析.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4 (1): 36-45. [Xiao Yun and Deng Rui. 2015. The Plight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into Urban Community.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4(1): 36-45.]
- 谢小芹. 2019. “场域—行动分析”视角: 贵州西村农民的旅游抗争. 人文地理, 34 (4): 135-142. [Xie Xiaoqin. 2019. "Field-Action Analysis": The Tourism Struggle of Farmers in Xicun, Guizhou Province. *Human Geography*, 34(4): 135-142.]
- Yang J. 2013. Social Exclusion and Young Rural-Urban Migrants' Integration into a Host Society in Ch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48(1): 52-69.
- 杨菊华. 2009. 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 人口研究, 33 (1): 17-39. [Yang Juhua. 2009. From Segregation, Selective Integration to Assimilation: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Population Research*, 33(1): 17-39.]
- 杨菊华. 2015.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2): 61-79, 203-204. [Yang Juhua. 2015. Research on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2): 61-79, 203-204.]
- 杨菊华. 2018.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维度建构与模式探讨.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4): 71-80. [Yang Juhua. 2018. 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and Conceptual Analysis of Citizenization of Rural-Transfer-Population. *Journal of Jiang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4): 71-80.]
- 叶裕民. 2015. 特大城市包容性城中村改造理论架构与机制创新——来自北京和广州的考察与思考. 城市规划, 39 (8): 9-23. [Ye Yumin. 2015.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the Inclusive Urban Village Reconstruction in Chinese Megacities: Study and Reflections on Beijing and Guangzhou. *City Planning Review*, 39(8): 9-23.]
- 应婉云, 罗小龙, 吴春飞, 田冬. 2015. 市民化视角下就地城镇化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基于福建省泉州市的实证研究. 规划师, 31 (3): 17-21. [Ying Wanyun, Luo Xiaolong, Wu Chunfei and Tian Dong. 2015. Basic Public Service Needs at In-Situ Urbanization Area: Quanzhou City, Fujian Province. *Planners*, 31(3): 17-21.]
- 张红霞. 2019. 场域变迁与规则重构: 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交往的微观机理.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38 (1): 111-117. [Zhang Hongxia. 2019. Field Transition and Rule Reconstruction: The Micro Mechanism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New Migrant Workers. *Journal of Chinese Youth Social Science*, 38 (1): 111-117.]
- 张慧, 李诚. 2014. 社会场域变迁背景下的失地农民城市融入问题研究——基于对昆明市Z社区的回迁调查. 学术探索, (7): 62-67. [Zhang Hui and Li Cheng. 2014. Research of Urban Landless Farmers' Integ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Field Change-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Community Z in Kunming City. *Academic Exploration*, (7): 62-67.]
- 张泽宇, 李贵才, 龚岳, 罗昱辉. 2019. 深圳城中村改造中土地增值收益的社会认知及其演变. 城市问题, (12): 31-40. [Zhang Zeyu, Li Guicai, Gong Yue and Luo Ganghui. 2019. Social Cognition and Its Evolution of the Land Appreciation Benefit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Village-in-City in Shenzhen. *Urban Problems*, (12): 31-40.]
- 章征涛, 刘勇. 2019. 城中村改造中的“增长联盟”研究——以珠海市山场村为例. 城市规划, 43 (7): 60-66. [Zhang Zhengtao and Liu Yong. 2019. Growth Coalition in Urban Village Re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on Shanchang Village of Zhuhai City. *City Planning Review*, 43(7): 60-66.]
- 郑杭生. 2005. 农民市民化: 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 甘肃社会科学, (4): 4-8. [Zheng Hangsheng. 2005. Citizenization of Peasants: An Important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ology. *Gansu Social Sciences*, (4): 4-8.]
- 周皓. 2012.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及理论思考. 人口研究, 36 (3): 27-37. [Zhou Hao. 2012. Measurement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Immigrant Assimilation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36(3): 27-37.]
- 朱伟珏. 2007. 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经济意义. 天津社会科学, (3): 84-89. [Zhu Weijue. 2007. Cultur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The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Pierre Bourdieu's Culture Capital Theory.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3): 84-89.]
- 祝仲坤, 冷晨昕, 陶建平. 2019. 社区场域与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 (6): 82-93, 158-159. [Zhu Zhongkun, Leng Chenxin and Tao Jianping. 2019. Community Field and Urban Identity of Migrant Workers.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9(6): 82-93, 158-159.]

Citizenization of Villagers in City Based on Field Theory: A Case Study of Liede Redeveloped Community, Guangzhou

Pan Zhuolin¹, Liu Ye¹, Liu Yuqi² and Li Zhigang³

(1. a.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b.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3. a. School of Urban Design, Wuhan University; b. Hubei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Research Center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ncrement planning to inventory planning in large cities has initiated the upsurge of urban village redevelopment. However, this redevelopment has overemphasized the economic benefits while neglecting the social benefits behind the redevelopment, resulting in villagers' difficulties in re-employment, inadequate social security, and other problems regarding citizenization. Taking the Liede redeveloped community as a case study, and using the field theory of Bourdieu, this paper adopt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data from questionnaire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measure urban villagers' level of citizenization after the redevelopment. The level of citizenization is measured through the four dimension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structura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identity.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o some extent, although the redevelopment of Liede village has brought new changes to community management, th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continues to undertake a large number of community services and livelihood security function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aily life of villagers. The villagers and the village collective have formed an exclusive and closed pattern based on their common interests. Villagers have sought safety strategies for action and decision-making when fac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ir conservative economic strategies and homogenous social networks have resulted in little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and quantity of their capital. In essence, the new village community has not been restructured along with the redevelopment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capital of stakeholders is in a relative state of equilibrium, which has not motivated the villagers to adapt to their new environment and reconstruct the structure of the field. After the redevelopment of Liede village, the villagers'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d, their basic rights were secured, and their newly-moved in neighbors also exerted a demonstration effect, which considerably improved villagers' consciousness of their roles as citizens, their behaviors, and their way of thinking. However, many villagers have not achieved self-empowerment or integrated into the urban society, judging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citizenization. In term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difficulty of employment persists. Regarding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can effectively adapt to urban society, while the older generation's habits and ways of thinking are solidified. In terms of structural integration, without a platform to interact with other social groups, it is difficult for villagers to expand their social network. Finally, regarding social identity, villagers' social status has not improved with their economic status, and the recognition of their roles as citizens is inadequate.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is advised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village communities, regard the citizenization of villagers in cities as long-term social work, and carry out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skills training to enhance the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of villagers, and facilitate their integration into urban society.

Keywords: urban village; field theory; citizenization of urban villagers; Guangzhou; Liede Community